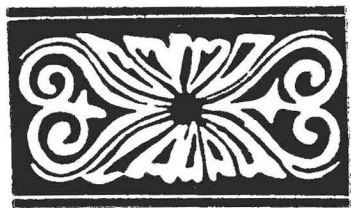


苗侗文坛

1998 3



MIAODONG WENTAN



苗侗文坛 1998 第 3 期总第 39 期

主 办 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

编 辑 苗侗文坛编辑部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

邮 编 556000

电 话 [0855]8222632

主 编 杨 霁

副主编 吴拴新

印 刷 贵州省黄平县民族彩印厂

黔新出(98)内资准字192号

苗侗文坛

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总第三十九期

盘瓠神话传说新探 舒向今 (3)

论炎黄蚩时代的人文精神及

其对中华史的影响 麻勇斌 (15)

苗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 石朝江 (29)

爱国主义与民族关系 张永祥 (44)

杨 诚

“郎德现象”的启示 李嘉琪 (50)

开发黔东南人文资源,促进

民族旅游发展 杨再将 (53)

战争与西部苗族的迁徙 苗 青 (58)

试论苗族族源 吴正煦 (77)

苗族《焚巾曲》探古 王秀盈 (84)

苗族宗教论 吴正煦 (91)

蛋在侗族社会生活中的民

俗功能 潘永荣 (106)

侗族禁忌的分类、起因及功能

..... 刘宗碧 (109)

龙初凡

滇东南苗族的丧葬礼俗 罗有亮 (120)

侗家闹年锣 龙民怡 (127)

龙燕怡

赛年号 龙燕怡 (129)

黔东苗语龙泉话特点研究 ... 王凤刚 (131)

开觉苗语上声和入声的分

化过程 李炳译 (152)

角度广 资料实 结论新

——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简评

..... 胡廷夺 (159)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盘瓠神话传说新探

□ 舒向今

盘瓠神话传说始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以后又见于范曄《后汉书》、干宝《搜神记》、《晋纪》、郭璞注《山海经》、鲍坚《武陵记》、任昉《述异记》和《宋书》、《魏书》、《南史》等书。唐宋以后，虽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但史家、学者多照常引用。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把盘瓠的神话传说作为追宗寻祖的历史依据而载入族谱家书，并把盘瓠当成本族的始祖进行供奉，其祭祀活动延续至今。一个神话传说，甚至堪称“谎诞”的传说，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必有原故。正如拉法格《宗教与资本》中所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随着地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破译和“猜中”这些神话传说也许是可能的。本文试图利用地下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有关方面的资料，对盘瓠神话进行探讨，错误和不当之处肯定有之，望同仁指正。

一、盘瓠传说与葫芦崇拜

《后汉书》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不克，乃

访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李贤注云：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①。故事里的英雄，明明是只“畜狗”，其名不叫“犬”，而曰“盘瓠”，看来，“盘瓠”之名必有来历。前苏联著名学者海通在介绍澳大利亚一些原始部落图腾生育信仰时说，“妇女在某图腾圣地感孕，所生子女便属于该圣地图腾”^②。老妇人是因盘和瓠而得犬的，盘和瓠是否就成了“犬”的“图腾圣地”？所以把“犬”取名为“盘瓠”了。这与“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③；“玄鸟坠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④的图腾生育观念是一致的。庖牺氏的图腾为“蛇”，契的图腾为“玄鸟”，“犬”氏族的图腾自然就是“盘瓠”了。“盘瓠”何物？通俗一点说就是将瓠剖为两半的一种容器。瓠，《说文解字》曰：“匏也”，段说：“匏，瓠也”，瓠与匏实为一物，即我们通常所称的葫芦瓜。葫芦瓜在现代入看来是一种极普通的蔬菜作物，但在原始人类看来，却成了“圣物”，成了氏族的图腾。究其原因，恐怕与葫芦瓜在原始时代对人类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有关。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靠采集，而野生野长的葫芦瓜，则很可能是人们采集食物的主要对象。所以古人才有“绵绵瓜瓞，人之初生”^⑤的诗句。由于葫芦瓜味鲜、产量高和容易栽培等特点，它很可能又是人类进入栽培农业的先导。葫芦瓜类的栽培成功，为其他农作物的栽培积累了经验，以后才会有稻、粟等作物的出现。稻、粟等粮食作物栽培成功，才使人类从采集经济走向农耕经济，从不定居到建立固定的村落，从而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和人身安全有了基本的保障，标志着人类“野蛮时代”的结束和“开化时代”的到来。这种划时代的变更，葫芦瓜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栽培农业的成功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葫芦瓜仍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食品之一。前不久，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发掘湖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就发现了一大批植物籽、

茎叶。经鉴定，属人类栽培的作物有稻、粟、蕷苡、冬瓜和小葫芦瓜^⑥。其中意义最大的自然是稻。稻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化的成熟和繁荣。但是，作为“人之初生”的葫芦瓜，这时仍未退出历史舞台，还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古人一直把做饭的厨房称之为“庖”。庖即匏，意为厨房是“贮放匏和烹煮匏的地方”^⑦，就连被称之为人类始祖的“伏羲氏”，其名也曰“庖牺”，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伏羲就是葫芦。可见，葫芦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了。其次是葫芦对陶文化的启导作用。有学者认为：在陶文化还未出现之前，曾有过“葫芦容器时代”。刘尧汉先生在《论中国葫芦文化》中绘制了众多的割切葫芦容器，并例举了陶器的器型是以葫芦容器的形状为依据的。刘先生的这些设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在原始采集经济阶段，或在农耕经济期间，肯定有很多不能食用的老葫芦瓜，由于葫芦的外壳轻便、坚硬和具有容纳性，很自然地成了人们的贮盛工具，人们将根据生活的需要，将葫芦切成不同形状的器型，于是用瓠做成的罐、钵、壶、杯、盆、瓢之类的容器便产生了。其中以葫芦的下半部鼓腹处横切为钵、从葫芦束腰处横切成罐和将整个葫芦剖为两半为盘应是葫芦容器最多见的器型。后来陶器的圜底罐、圜底钵等陶器造型，很可能是按葫芦容器的罐、钵的造型而烧造的。说不定盘瓠部落的第一件陶器就是以葫芦容器为模胎，自觉或不自觉地烧制成功的。正如摩尔根记述的那样：“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之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本身也可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于世界之上了”^⑧。“南美东南海岸的土著家用的木制容器，甚至煮沸食物的壶罐，都涂着一指厚粘土，以防火的焚烧”^⑨。“我国滇东马关县彝族，现在还按传统用葫芦作胎烧制容器”^⑩。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洞庭湖区发掘的年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9000余年，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制作原始，器类极单调，几乎全为圜底器：有罐和钵两大器型”，“而深腹钵底部，常有黑褐色火烧痕迹，很多陶器底部明显厚于腹部，陶片断层可以观察到有多个层次，有的陶器底部，足足贴有八、九层泥片，推测应是采用

贴塑法或称“敷积模制法，泥片贴筑法制作”。^⑪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酷似葫芦容器（如圜底罐、圜底钵）的造型和按葫芦容器为模胎（敷积模制法）的制作方法，证明“葫芦”为陶器的出现和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就是葫芦的“救生”功能。在原始时代，人类时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其中威胁最大的莫过于特大洪水了。那时的河道不通，人类本身又缺乏防洪设施和救生设备，每当洪水泛滥，便是人类灾难的来临。特别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对无防护能力的人类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民间传说的“洪水葫芦”的故事，正好反映了这种历史事实。相传在天地之初，大地洪水泛滥，世上的人，动物都被洪水淹没了，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坐在一个大葫芦里，浮出水面，洪水退后，世上仅存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后奉天神之命，兄妹二人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在这场特大洪水中，葫芦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它不但救了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而且还拯救了人类。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崇拜葫芦，尊葫芦为祖神或以葫芦为图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葫芦是否真的能起到“救生”的作用呢？据《国语·鲁语》云：“夫苦瓠不材，于人共济而已”，《诗·瓠有苦叶》曰：“瓠有苦叶，济有深涉。”说明古时的瓠（葫芦）可以做舟，可以渡水，又樊绰《蛮书》载：唐代滇西产大葫芦，“瓠长丈余，皆三尺围”。加拿大的一名退休职员培育了一个西葫芦其重340公斤，周长3.79米^⑫。如此大的葫芦，做成舟，乘坐二、三人渡水应是毫无问题的。当然，像如此大的葫芦，毕竟不多见，所以伏羲兄妹偶得这一特大葫芦，在洪水中得以生还，这本身就是一件神奇之事，加上他们婚后繁衍了人类，这就是构成后人的许多联想和崇拜心理的主要原因。于是，葫芦崇拜便由此产生了。然而，对葫芦的崇拜，主要流行在南方的“蛮夷”部落，其中盘瓠部落便是其主要成员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氏族部落的增多，各氏族部落为了区别于其他部落，增强本部落的凝聚力，便根据本部落的性质、特点和生存、发展的需要，树立起新的图腾标志。与“犬”有着深厚感情的、并在生产、生活和安全等方面又离不开“犬”的原崇拜葫

芦的子部落，这时把“犬”做为本部落的图腾标志。为了不忘原集团图腾“葫芦”，于是便把“犬”称之为“盘瓠”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二 盘瓠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联系

盘瓠传说发生在高辛氏时期，距今约 5000 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文化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高辛氏，即帝喾，中国传说时代的“五帝”之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其实，在五帝时期，中国并不统一，南北方国林立，其中势力最大者，应数南方的“九黎部落”或曰“三苗集团”了。“五帝”只不过是当时的各部落联盟的盟主罢了。为了巩固联盟和维护其盟主地位，做为一代明主贤君的帝喾，肯定会采取各种能为之加强联盟体的措施。其中也包括与他部落和亲和联姻。这种办法，也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加强民族团结常用的方法之一。因此，帝喾将其女下嫁给势力强大的三苗集团中的首领或对联盟做出过重大贡献者，应是完全可能的事。传说中的帝女妻盘瓠的故事，就不一定是“纯属虚构”。至于盘瓠是否真有其人，我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盘瓠部落！如有又在那里？其文化面貌何如？这倒是人们所关心的事情，也是本文想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据《后汉书》曰：“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走南山止石室中……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李贤注曰：“今辰州泸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1]。说明盘瓠立功后，帝喾不仅将其女许配了盘瓠，而且还给了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就是以武山为标志的古辰州地，或曰古五溪地。即今以怀化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为中心地带的湘西地区。八十年

代初，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在五溪地区的腹心之地，怀化市新建了高坎垅，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小沙河南岸的阶地上，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这里是一处山谷盆地，四面环山，山高“万仞”，小沙河由西向东注入沅水，是该地通向外地的唯一通道。涓涓溪流、郁郁林木，真有一种“世外桃源”之感。1984年冬，湖南省博物馆，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680平方米，出土墓葬48座，器物340余件。其中石器有斧、铤、铲、刀、凿、镞、纺轮等；陶器有釜、瓮、罐、壶、孟、单耳杯、曲腹杯、簋、盆、碗、豆、纺轮、器盖等；玉器有铲、璜、镯、黻等。从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于洞庭湖区的王家岗、划城岗、车轱山、三元宫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近似，其文化内涵应归入屈家岭文化^⑬。从遗址的揭示和墓葬的打破关系看，高坎垅文化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屈家岭早期，第二期为屈家岭中期，第三期为屈家岭晚期，根据炭14测定，屈家岭文化的年代为5300—4600年之间^⑭，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相当。早在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北京山屈家岭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⑮。“由于文化内涵和中原地区原始文化有着明显不同，具有较多的自身特征，因此考古界公认是一种新的系统，并定名屈家岭文化”^⑯之后，又相继在湖北京山朱家嘴^⑰，武昌放鹰台^⑱，郧县青龙泉、大寺^⑲，钟祥六合^⑳，枝江关庙山^㉑，松滋桂花树^㉒，公安王家岗^㉓，河南淅川下王岗^㉔，下集^㉕，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㉖，安乡划城岗^㉗，华容车轱山^㉘，怀化市高坎垅^㉙，江西修水跑马岭等^㉚地发现与屈家岭文化相同的文化遗址数十处。其范围北界到河南的南阳地区，西界到三峡一带，东界到湖北的黄冈和黄石，南界到江西的修水和湖南的怀化。这个范围，恰与传说时代的“三苗”活动范围相一致。《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正义》注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说苑·君道》、《韩诗外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虽南、北，左、右互有颠倒，但三苗活

动的基本范围应是一致的，即洞庭，鄱阳之间，江淮一带，与考古学的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相吻合。因此，把屈家岭文化认定为三苗文化应无大谬。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初，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澧县城头山发掘了一处屈家岭文化期的古城址^②。城址平面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夯、土台基和东、南、西、北四城门组成。建造年代上限为屈家岭文化中期，下限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距今4700—4000年左右。据城址发掘的总领队何介钧先生说：“城头山古城和郑州西山古城大体同时，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城”^③，在清理城址的叠压层下的属大溪文化早期的大围壕时，“在围壕淤泥中出了大量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船桨、船艄和100余种植物的茎叶籽实及大量的竹、苇编织物，麻织物。说明在古城出现之前，这里已是一个规模有10万平方米，经济发达的大型聚落，进而形成文明的城邑国家形态，即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④。说明早在5000年前，三苗集团已立国，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具有与中原部落抗衡的能力。所以史书上常出现“三苗复九黎之恶”^⑤，“三苗匪用命”^⑥，“昔者三苗大乱”^⑦，“三苗在江淮数为乱”^⑧等不听命华夏集团，分庭对抗的局面。然而，三苗集团，虽已立国，但毕竟还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体，三苗之“三”，即多之意，“三苗”，即多个苗裔部落联合体。从考古学文化中也可得到印证。现已发掘的数千处屈家岭文化遗址，除具有共同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外，由于区域不同，部落不同，其文化面貌各具特色。早在80年代初，俞伟超先生就根据其特点，将屈家岭文化划为四大类型：一是原来的大溪文化区，包括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澧县三元宫等遗址；二是包括屈家岭在内的沮水流域及其两侧，大致是西达汉水下游，东至鄂东；三是鄂西北至豫南的下王岗中期和青龙泉二期；四是江西修水山背跑马岭遗存^⑨。之后，湖南省博物馆又在洞庭湖区的安乡县划城岗，发掘了一处屈家岭文化遗址，“与京山屈家岭比较，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可认为是屈家岭早期的一种地区类型”^⑩。不久，又发现了怀化高坎垅遗址，其文化面貌虽可归于屈家岭文化，但与洞庭湖区各主要遗址出土的文物却存在明显的

差别,最突出的表现是,洞庭湖区屈家岭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束腰穿孔扁
平石铲、圆锥足或扁锥足的釜形鼎、甑、细颈折腹或球腹壶、长筒腹平
底瓶、矮颈鼓腹圈足罐等典型器,而在高坎垅遗址中不见或少见;而高
坎垅遗址中出土的长方形弧刃扁体石刀,有肩石斧、圈底釜和部分杯、
罐的腹部附加宽大的单耳,在洞庭湖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则不见或
少见,另外高坎垅遗址的墓葬,其随葬的陶器大多是器体高大的实用
器,还有将器物打破后下葬的习俗也不见或少见于洞庭湖区的屈家岭
文化遗址。高坎垅遗址“表现出来的自身特点,显然不能归入洞庭湖区
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中,因此,我们认为应划出一个新的地方类型,
即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⁴⁰。值得注意的是,高坎垅遗址 M³⁷ 出土一件
“犬型陶塑”,这又为我们判断高坎垅类型的族属,提供了重要依据。陶
塑为泥质红陶,由两犬合成,两犬头背向,犬身合为一体,似交尾状。
其高 9 厘米,座宽 11.4 厘米。原报告将其定为“器盖”或“可能是陶
塑装饰品”⁴¹,笔者仔细地核对和检查了该墓所出土的器物。却未发现能
与之配套的器物,加之陶塑的底足为平沿,不宜作器盖使用,说是器盖,
不确。陶塑虽体内空,有一定的容纳性,但它不能倒置,更不可能是一
件实用器。说是装饰品,倒有几分可能,因陶塑形态逼真,模样温柔可
亲,很有艺术和观赏价值。不过,这对原始人类来说,恐怕有点超前意
识了。其真正用途,仍需考究。根据该墓出土的器物看,除出土一件犬
型陶塑外,还出有瓮、罐、豆、杯、盆等陶器和一件质地高雅的玉璜。
值得注意的是,随葬器物中却不见生产工具,这在该遗址出土的墓葬中
是少见的。说明墓主人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一般平民。从该墓出土的犬
型陶塑和玉璜分析,墓主人很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玉器在古代不仅
可做装饰品,而且还具有“事神、通神”的功能。《山海经·海外西
经》在记述夏后启作法时曰:“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
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说明玉璜是古代神权人物在事神作法
时所佩戴的法器。显然, M³⁷ 的是一位神权人物无疑。犬型陶塑与神权
人物一起下葬,说明犬型陶塑与宗教信仰有关也就可肯定了。在原始人

类的宗教信仰中,图腾崇拜是“人类集团成员们共同性的一切已知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它最广泛地流行在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⁴³。高坎垅遗址出土的这件犬型陶塑应是一件图腾崇拜物。如果这种判断不错的话,高坎垅遗址及其墓地应为信奉犬图腾的盘瓠部落的居住遗址和其公共墓地。前文已述,高坎垅文化属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三苗文化,那么,高坎垅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应为三苗集体中的盘瓠部落的原始文化。这恰与盘瓠神话传说在时代和地望上相一致,说明在传说时代,确实存在过信奉犬为图腾的盘瓠部落。

三 盘瓠传说与五溪地区的盘瓠遗风

盘瓠传说发生在五溪地区。汉以后的史家多把居住在五溪地区的民族泛称为“五溪蛮”,并冠之为“盘瓠子孙”。《水经注》曰:“武陵有五溪,谓雄溪、獠溪、沅溪、酉溪、辰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史记·正义》曰:“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后也”。《元和郡县志》亦云:“辰州,蛮夷所居,其人皆盘瓠子孙”。《溪蛮丛笑》曰:“五溪蛮,皆盘瓠种也”。瑶族的《过山榜》、《评皇券牒》也有“始祖盘王”、“盘王圣祖”的记载,麻阳苗族《接龙歌》唱道:“五月初一开神门,敞开神门接祖神。尊祖祭祖礼当先,水有源头树有根。盘瓠大王是我祖,从古流传到如今。”说明五溪地区的瑶、苗等少数民族对盘瓠的崇拜确是事实。据调查,五溪地区的许多地方都曾建有盘瓠庙、辛女庙(祠)等祭祀性的建筑。仅麻阳县境就多达数十座,其中锦河沿岸就有18座⁴⁴。漫水的盘瓠庙现正殿仍保留完好,殿内设有“盘瓠大王位”石碑位,正殿横枋上雕有盘瓠神象(龙犬),每逢农历五月初一,当地苗民都要在此举行祭祀活动。怀化市的沅阳镇也有盘瓠宗祠,祠内有木质浮雕“神犬”祖龕。接龙乡桥头村有接龙庵,庵内神台上立有一尊高1.1米、长1.5米的木雕黄狗像。铜湾乡铜鼎村与青市两村内都建有“狗王庙”,解放初期拆除⁴⁵。辰溪县船溪驿有辛女宫,小溪河有辛女祠,辛女坪有辛女庙,沅陵县棋坪有辛女庙,花垣县民乐镇有

神女庵。泸溪县南三十里辛女岩有盘瓠庙（亦称辛女庙），相传是苗民的祖庙，明清时期每逢7月25日至7月29日，各寨苗民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四方云集于庙，扶老携幼，环宿庙旁凡五日，祀以牛豕酒醑、椎鼓、踏歌欢饮而还。”^④据石宗仁先生考证：位于湘黔川三省边地的永绥县（今花垣县）米诺场边的圣母（又名辛女）庵，位于凤凰、永绥、乾城（今吉首）、松桃四县边地的盘瓠洞，乾城、保靖、古丈三县边地旧称所里的盘瓠庙，沅陵、泸溪、古丈、乾城四县边地的棋坪辛女庵，泸溪、辰溪、沅陵三县边地辛女岩上的辛女祠，麻阳漫水盘瓠庙，是旧辰州苗族崇拜盘瓠的六大中心场地^⑤。

另外，有关盘瓠、辛女传说的遗迹也不少。《后汉书》载：“辰州泸溪县西有武山……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踪。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象也。”^⑥今吉首市境内有武山，其情状与书中记述大体相同，那半山腰上的洞口，当地苗胞称为“祖先的大门”^⑦。《湖南苗史述略》云：“辛女岩，泸溪县南三十里，高七十九丈八尺，危峰高耸，有石屹立如人，相传高辛氏之女于此化为石。”用盘瓠、辛女命名的山川、河流、地名有：泸溪县辛女岩下的洞叫盘瓠洞，岩下流过的溪叫辛女溪，县内还有辛女桥、辛女滩、辛女潭、狗王岩等；花垣县有盘瓠村；沅陵县棋坪有辛女山、辛女岩，舒溪口乡有辛女溪，张家滩有狗公寨；辰溪县有辛女坪，凤凰县有盘瓠洞，吉首市有辛女岩，辛女溪等。

有关崇拜盘瓠的习俗还有：湘西一带的端午节划龙舟，并不都是为了纪念屈原。有的则是为了纪念盘瓠。相传盘瓠（龙王）是乘船溯沅水而进入“五溪”的。现麻阳苗族，每逢农历五月初一，都要到盘瓠庙（或曰龙王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名曰接龙，然后再到江里赛舟，场面宏大，热烈。如逢天旱，则要抬着盘瓠（龙犬）神像求雨。怀化市郊的一些乡村，多在房屋中堂大门上方雕一对“梅花”（即狗脚印）型木雕装饰，每逢过年过节，主人则在其上挂上花色布条，焚香拜祭；过农

历年时，还盛行舞“狗布龙”，所到之处，以示吉祥。湘西一带的苗、瑶、侗族地区，老一辈是禁吃狗肉的，现在虽开放了些，但过年过节和招待客人，是不许狗肉上席的；溆浦、洞口的一些瑶族山寨，在阴历年三十，祭祀祖宗，主人在非常严肃气氛下将家狗从中堂的门槛下来回穿三下，并要学狗的叫声连叫三声，其意是接祖先回来过年。整个五溪地区，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乡间的小孩多爱戴狗头帽，爱取狗字名，据村民解释，戴狗头帽，取狗字名，孩子好养，可避邪，不易生病。诸如此类，还可列举许多，其意除表示对祖先盘瓠的崇拜外，还有借祖神避邪之意。

盘瓠传说发生在五溪地区，盘瓠部落的原始文化在五溪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这一地区众多的有关盘瓠遗迹、遗风、遗俗，证明盘瓠的神话传说并非“纯属虚构”。

注

① ⑬ ⑭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 海通《图腾崇拜，实质和起源》。

③ 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

④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⑤ 《诗·大雅·绵》

⑥ ③③④ 何介钧《洞庭湖区的早期农业文化》，《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⑦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

⑧ ⑨ 摩尔根《古代社会》。

⑩ 刘尧汉《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贵州民族》1985年第1期。

⑪ 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

⑫ 《参考消息》1989年10月23日。

⑬ ③④ ④② 《怀化高坎垅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⑮ ⑰ 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考古辑刊》第1集。

⑯ 《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 ⑬《湖北京山朱家嘴新石器遗址第1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5期。
- ⑭《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 ⑮《1958年至1961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 ⑯《钟祥县六合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 ⑰《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
- ⑱《湖北松滋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3期。
- ⑲《湖北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 ⑳《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1972年第10期。
- ㉑《淅川下集附近发现古遗址》，《文物》1960年第1期。
- ㉒《澧县梦溪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 ㉓④⑩《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 ㉔《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1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 ㉕《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第7期。
- ㉖《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城址被确认》，《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
- ㉗《尚书·吕刑》孔颖达疏。
- ㉘《礼记·缙衣》。
- ㉙《墨子·非攻下》。
- ㉚《史记·五帝本纪》。
- ㉛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
- ㉜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㉝赵海洲《麻阳苗族盘瓠文化的特点》，《民族论坛》1990年第3期。
- ㉞周德林《湖南怀化市的盘瓠文化遗存》，《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
- ㉟《辰阳风土记》。
- ㊱石宗仁《湖南五溪地区盘瓠文化遗存之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 ㊲李槐荪《五溪与盘瓠神话》，《湖南日报》1988年5月7日。

〔责任编辑 扬 槩〕

论炎黄蚩时代的人文精神及其对中华史的影响



苗族
麻勇斌

一、导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古老族群，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开创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人文始祖，是炎帝、黄帝和蚩尤帝（《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蚩尤，古天子。”）。然而，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上，由于缺乏历史相容性和大文化观念的封建民族精神的迷障，对炎帝、黄帝和蚩尤帝这三位始祖共同铸造中华文明史胚基的过程，以及所张扬的人文精神，观察、理解和诠释充斥着狭隘的排斥情绪，因而导致了历史的真实遭受歪曲，丰富完满又激昂亢奋的人文精神遭受错误地肢解和畸形地模塑。

对于中华史来说，歪曲五千年文明胚基的开创过程，错误地肢解和畸形地模塑炎黄蚩时代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它造成了应当完美无缺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历经数千年发育到现当代，还在许多地方暴露出